

回到原初语境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

李双套

[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每一个具体结论都有其产生的原初语境。只有从原初语境出发,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确认识马克思具体结论的价值,并科学运用这些具体结论。原初语境包括时代语境、思想语境、文本语境和历史文化语境。回到时代语境,是指考察马克思的具体结论是在何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解决我们今天的理解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时间间距”问题;回到思想语境,是指回到思想的整体性,把马克思的具体结论放到马克思整体思想中理解;回到文本语境,是指从文本的针对性和上下文语境中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回到历史文化语境,是指从马克思得出具体结论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而不是以“他者”或“后世”眼光代替“作者”眼光看待具体结论。

[关键词] 时代语境;思想语境;文本语境;历史文化语境;具体结论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25)02-0024-0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1]。因此,理论清醒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要做到理论清醒,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完整准确的理解,进而言之,就需要回到原初语境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严密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每一个具体结论都有其产生的原初语境。按照语言学家的观点,语境即语言环境。那么原初语境,即原初的语言环境,也就是主体提出某一观点的思想前提和背景。主体总是在特定的场合、针对特定的问题、用特定的观点表达特定的意义。特定的主体、特定的场合、特定的问题等都具有思想前提和背景的内涵,也就是具有原初语境的

内涵。脱离原初语境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在理论上,会导致教条化。所谓教条化,就是抽离出具体结论的原初语境,把在特定场合、针对特定问题得出的个别结论永恒化。在实践上,会导致盲目化。所谓盲目化,就是离开具体结论的原初语境,剥离掉结论成立的前提,把在特定前提下才能实施的行动当作可以离开这一前提而任意实施的行动。因此,需要从原初语境出发,以便正确认识马克思具体结论的价值,并科学运用这些具体结论。

一、回到原初语境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语言是社会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收稿日期] 2024-06-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研究”(22AKS009)。

[作者简介] 李双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环境中使用语言,“语言……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2]。可见,语言因交往而产生,语言受到交往目的、对象、状态的影响。理解语言的意义离不开“社会”“实践”“人的存在”“交往”和“需要”。要把语言本身固有的意义和它们的使用者、使用条件联系起来,也就是要回到原初语境中去理解语言的意义。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回到原初语境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但遗憾的是,脱离原初语境孤立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并不罕见,而且这一倾向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比如,对马克思思想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常有人将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决定性作用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有学者在反驳这一理解时,提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弱决定论。应该说这只是形式上的辩护。要准确理解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决定性作用,就要回到马克思这一表述的原初语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其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3]。他明确指出要从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生产方式,进而用生产方式解释市民社会和全部社会意识。这种历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4]。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并没有谈及制约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如政治、环境、人口等,也没有就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展开论述。但是,不能据此判定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者”。马克思之所以主要关注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没有全面、完整、系统地论述其他因素的非决定性作用有语境原因。这个语境原因就是:为了反驳论敌,他“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5]。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是弱决定论,也不是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他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因为论敌

否认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不得不着重强调这一原则。可见,马克思主要关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因为他不是直接正面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只是在“破中立”。这就导致后人在学习马克思思想时,离开马克思当时论述这个问题的语境,认为马克思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经济决定论”。

再如,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哲学理论”的理解。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马克思在研究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从封建社会产生的路径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马克思认为根据西欧社会发展的规律,“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进而进一步发展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以后人类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论》出版后,在俄国形成很大反响,受到俄国民粹主义者关注。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他赞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但是,他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理解为历史哲学理论,他认为《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章的论述“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初阶段的历史特征,但是给出了整个历史哲学理论”^[7]。“历史哲学理论”即把社会形态学说理解为具有绝对普遍意义的历史理论。按照这种理解,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任何国家要想进入共产主义,必须先进入资本主义的结论。如果这样,对于俄国来说,就要先废除农村公社,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再进入共产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81年2月,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马克思就俄国历史发展前景,特别是农村公社命运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信中,查苏利奇告知马克思:在俄国,民粹主义者阅读《资本论》以后,根据其中的观点,认为俄国农村

公社必定会灭亡。她询问马克思是否可以就“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她看来,马克思的看法“将使我们获得极大的帮助”^[8]。那么马克思到底是不是认为任何国家要想进入共产主义都必须先经过资本主义呢?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和研究“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9]。可见,对于俄国农村公社是否会灭亡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回答是还是不是。在《资本论》中,他也没有讨论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他所研究的资本积累问题“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10]。他“只不过”是想要描述西欧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没有明确说明西欧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基于此,马克思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在“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看来,“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指《资本论》中描述的西欧历史变迁道路——引者注)”^[11]。

二、回到时代语境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

人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人,人说话都具有一定时代背景,脱离一定时代就无法理解语言和理论。不同时代的人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12]各不相同。一个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归根结底由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决定。所以,理解语言离不开语言讲授者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性质。

比如,对马克思有关教育和童工论述的理解。1875年,受拉萨尔派影响,《哥达纲领》提出“禁止童工劳动”和“实行免费教育”的主张。马克思认为这些主张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是“反动的”^[13]。如果不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状况出

发理解马克思的反对意见,就不容易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反对“如此好”的主张。

马克思认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社会存在的前提就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被压迫阶级的存在是阶级社会存在、延续的基础,因此必须保证被压迫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14]。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已不具备这一条件,他们的收入已经不足以养活包括未成年子女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此情况下,工人阶级子女被迫辍学,成为童工。若不成为童工,将面临生计问题。对任何人而言,生存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解决吃喝住穿问题,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视为“第一个历史活动”^[15]。生存比接受教育更为迫切、更为基础、更为重要,如果生存问题解决不了,自然谈不上教育等其他问题。由于生存的紧迫性,工人阶级子女需要当童工,不管教育是否免费,他们都没有时间去接受,他们无法真正享受这一权利,这一权利对他们来说是虚幻的。反过来,资产阶级子女有充足的时间去接受免费教育。本来是工人纲领提出的诉求,因为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条件,反而有利于资产阶级了。可见,离开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免费教育就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和“空洞的虔诚的愿望”。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批判免费教育本身,而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免费教育的虚伪性。他认为教育问题的解决不应该只从教育本身入手,而应该从社会入手,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改变社会制度入手。为了保障工人阶级子女受教育权,首先要保证工人家庭的收入能够养活包括未成年子女在内的全部家庭成员。只有这样,免费教育对工人阶级来说才有意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童工的罪行,控诉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但是,马克思并不止于义愤和道德评判,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禁止童工”。生计问题具有优先性和紧迫性,由于工人家庭收入不足以支撑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活支出,所以,马克思反对禁止使用童工。因为,

如果“禁止童工”，那么等待工人家庭的只能是生活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和基本生存的举步维艰。相比于童工问题，这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所以，“禁止童工”不仅无法解决童工问题，还会带来比童工问题更为严重的生存问题。在做童工和不做童工之间选择，工人阶级子女只能被迫做童工，以保障生存。

所以，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条件下，《哥达纲领》要求普遍禁止儿童劳动不可能实现，“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16]。在马克思看来，童工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我们不可能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来解决童工问题，而只能通过发展生产、改革生产关系来解决。所以，他认为“禁止童工”政策是反动的，这里所言反动并非从道义上讲。如果从道义上讲，“禁止童工”是正义的，使用童工把本应属于人类身体和智力发展的时间用来从事生产，违反了人类的自然发展规律。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反动，是指“禁止童工”政策违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不符，和当时工人阶级所处的境况不符，这是从历史评价维度讲的。

可见，童工问题和工人阶级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当时，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机器的发明与应用，劳动程序简化，劳动所需要的体力减少，工厂工作开始程序化、简单化、流水化、轻便化，原来需要成年男子才能从事的工作，儿童也能从事。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不是普遍禁止童工，而是通过斗争限制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从长期来说，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从短期来说，童工的使用不可避免，那只能通过斗争打破资本家毫无底线的剥削，逐步缩减童工的劳动时间，让童工在劳动之外能有一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也就是实行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当然，马克思只是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作为“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17]，并非说在一切社会、一切时代，教育都需要和劳动直接结合，实行“半工半读”。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就是教育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制度要求。

可见，马克思的具体结论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下提出来的。

我们今天理解这些具体结论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解决“时间间距”问题，不能把马克思基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性质而提出的具体结论，当作适用于任何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任何社会的抽象结论。

三、回到思想语境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

理论是系统性的学说，任何严密的思想理论都是完整的整体。黑格尔指出，“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18]。因此，回到思想语境最关键的就是要回到思想的整体性。马克思的具体结论离不开其思想的整体，他的每个观点都只是其整体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整体性既包括思想内容的整体性，也包括思想价值追求的一贯性。

比如，对马克思阶级斗争思想的理解。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所以，唯物史观就是其哲学的整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如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共产主义的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立场等，都要从唯物史观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但是他一直坚持在唯物史观视域下阐释阶级斗争。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开篇就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9]但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更不是说阶级斗争是人类生活的唯一。事实上，主张阶级斗争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但是阶级斗争思想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已是经验事实。在理论上，当时的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已开始深入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学界，最早论及阶级斗争学说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以及米涅等人。马克思称呼梯叶里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20]。在经济学界，法国重农主义者魁奈和英

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都对阶级进行过经济分析。如魁奈把社会分为生产者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不生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是用唯物史观去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从生产活动出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根源、性质、地位、作用、发展规律和前途。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先强调,“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历史的基础”,然后才谈到阶级斗争,并得出结论,“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1]。在这里,“因此”将“经济生产”和“阶级斗争”前后联系起来,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原因。从恩格斯的论述可以发现,阶级斗争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更不是唯一动力,相较于“阶级斗争”,“经济生产”更为根本。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在于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阶级斗争的基础,没有这种矛盾运动,就不会有阶级斗争。无论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多么重要,它只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只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而非“最终动力”“根本动力”。

再如,对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理解。我们要把对自由时间的理解放到马克思思想的价值追求中去。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呢?马克思思想所追求的价值具有一贯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3];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自由”和“全面”联系起来,形成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新判断,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5]。纵观以上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可以看出马克思始终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平等、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自主活动、

人的自由个性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一以贯之地关注人,在人的问题上,表现出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和彻底性。所以,要从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价值整体去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就自由时间而言,长期以来,人们将自由时间理解为非劳动时间,认为劳动时间不是自由时间,这实际上仍然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中去思考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核心不是“时间”,而是“自由”,要从人的自由发展这一马克思思想的价值追求出发理解自由时间。当人处在前自由发展阶段,他的劳动就完全是谋生性的,他在非劳动时间也是不自由的。当人实现了自由发展后,他的劳动时间也是自由时间。马克思说,“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26]。所以,当劳动时间的劳动摆脱异化性质,成为人的“自主活动”时,传统话语中的劳动时间将失去意义,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都将是自由时间,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将在这一意义上实现有机统一。

四、回到文本语境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

文本是思想的载体,最直接的语境就是上下文语境。上下文语境,也包括文本的针对性。因此,要从文本的针对性和上下文语境去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马克思在文章中多次提及消灭哲学、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消灭劳动、消灭道德等。那么,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说这些话的呢?从文本的针对性和上下文语境分析,马克思所要消灭的都是特定意义上的哲学、分工、私有制、劳动和道德,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比如,对马克思“消灭哲学”思想的理解。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批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说,“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而理论政治派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27];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指

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8];在《形态》中,他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129]。马克思主张消灭哲学,难道他自己的思想不是哲学吗?从马克思文本的针对性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是主张消灭哲学本身,而是主张消灭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写作具有针对性,不管是《导言》还是《形态》,他都是在批评对手的过程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比如,马克思写作《形态》的直接动机就是要回击1845年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三期上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观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最大特点是抽象性和思辨性,他们认为只要摆脱了思想束缚,就能解决现实束缚,在他们看来,“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130]。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观点纯粹是空想,“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31]。

再如,对马克思“消灭分工”思想的理解。一般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分工会越来越细,专业分工会越来越全面。但在《形态》中,马克思说,“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132]。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再消灭分工”呢?联系马克思讲述该问题的文本语境可看出马克思所言“消灭分工”的真实含义。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个社会内的分工,无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133]可见,马克思并不是主张消灭一切分工,相反,马克思肯定一般的分工,也就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分工。他也曾明确指出,消灭的“不是[一般]分工,而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分工”^[134]。所以,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分工只是消灭旧式分工或者说分工的旧性质,即消灭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剥削性质、雇佣劳动性质,而不是消灭一切分工。

还如,对马克思“消灭私有制”思想的理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35]马克思所讲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意思呢?这也需要联系上下文来说明。通过上下文语境,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三个层次来论证“消灭私有制”问题的。首先,所有制的形式及其变迁,归根结底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根据唯物史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36]。所以,所有制的产生和灭亡不是由个人喜好、愿望决定的。其次,马克思明确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私有制。一种是劳动者所有制,也就是“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这种财产是“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137]。这种所有制关系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现在,大工业把它消灭了。另一种是非劳动者所有制,也就是剥削他人劳动得来的财产,是由活劳动创造却被资本占有的财产。这种所有制是奴役人的所有制,其最后且最完备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第一种所有制,共产党人不消灭,也不需要共产党人消灭,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已经自然而然被消灭了。再次,消灭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138]。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39]此外,马克思话语中的消灭劳动、消灭道德、消灭正义等也都是从消灭特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道德和正义的角度去论述的,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说要消灭这些东西。

五、回到历史文化语境理解马克思的具体结论

所谓回到历史文化语境,就是要从马克思得出具体结论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而不是从后人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去讨论马克思具体结论的内涵,即要有“作者”视角。马克思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

景下得出具体结论的,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历史文化背景,而从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用“他者”或者“后世”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具体结论。

比如,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命题的理解。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该命题是思想家们的共识。通过该命题,思想家们所要表达的内涵是:宗教批判至关重要,具有前提性、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离开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去理解这个命题。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马克思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40]是因为宗教在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较大。19世纪中叶,德国人受到的宗教压迫较之英美更甚,在德国,宗教批判的作用也更大。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资产阶级相继建立政权,在此过程中,为封建主义辩护的教皇也被深刻批判。但是在德国,教皇对人民的剥削依然存在,“从路德宗教改革失败以来的300多年中,宗教一直是德国封建诸侯的思想意识,成为妨碍德国进步的精神桎梏”^[41]。当然,相对于批判宗教,如果能直接批判政治,则直击要害。但是在当时的德国,一方面,宗教批判较之政治批判更为安全,政治“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42];另一方面,批判宗教也同样能够起到批判现实的作用,“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的胚芽”^[43]。从马克思思想诞生的思想史背景看,19世纪中叶的德国,哲学家们的理论活动也大多集中在宗教批判领域,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都有宗教批判的相关著作,如《耶稣传》《基督教的本质》《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等。马克思的理论活动也是从宗教批判开始,不管是《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还是《形态》,都涉及宗教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在19世纪中叶的德国,宗教批判具有重要价值,“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44]。可见,马克思是在强调宗教对人的麻醉作用,因此需要揭露其维护旧制度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宗教政策。然而,宗教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如此。自古以来,中国的世俗政权承担思想教化职

能,不管是何种宗教,它的兴盛衰败都与世俗政权的支持与否有关,宗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批判宗教并不能起到批判现实的作用。在当下中国,宗教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复杂,宗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但不管怎样,和19世纪德国相比,宗教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较弱。

其次,从文化背景来看,对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习惯于站在中国近代史语境下解读这个命题,这和马克思提出这个命题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在19世纪德国的文化语境中,“鸦片”概念并没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仅仅是指镇静剂、安慰剂、药品,人在烦躁时,可以吸食它,从而让人安静下来^[45]。而在当代中国人的语境中,“鸦片”带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对个人而言,“鸦片”是毒品,吸食“鸦片”意味着摧残身体乃至失去生命。对国家而言,鸦片是丧权辱国的标志,它与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连。如果离开19世纪中叶的德国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仅仅从中国近代史语境出发,就会把鸦片是起镇静作用的药品理解为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毒品,把宗教是人民的安慰剂理解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毒品。马克思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仅仅是比喻,是想表达宗教具有欺骗人的一面。实际上,在《导言》中,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还有很多,诸如“颠倒的世界意识”“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精神抚慰”“现实的苦难的表现”“现实的苦难的抗议”“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人民的虚幻幸福”“人民处境的幻觉”^[46]等。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宗教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人创造了宗教”^[47]。而人之所以创造宗教,是因为人生活在“苦难”“压迫”中,宗教给人精神安慰,因此宗教是对现实的“抗议”,是“虚幻”“幻觉”“叹息”,是人们摆脱现实的一种方式。可见,马克思在这里肯定了宗教在抗议现实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了解甚少,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苦难中,又没有科学世界观指导的情况下,作为信仰,宗教能起到抚慰心灵、抗议现实的作用。因此,对宗教的抗议反映的是人们希望抗议现实苦难。当然,在马克思看来,抗议了宗教不是说

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现实的苦难就不再存在。他认为要想实现人的解放,不能只靠宗教,还需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从而改变人的异化生存状况。因此,如果离开19世纪德国的文化背景,只从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出发,就会夸大宗教的负面作用,把宗教理解为精神毒品;如果离开19世纪德国的历史背景,把这个命题当作一切时代的共同命题,则会忽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无法认识批判宗教与批判现实的紧密联系。

再如,对马克思“两个决不会”论断的理解。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48]论断。长期以来,我们都将这个论断理解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理论依据,并配以哲学上的“道路曲折论”加以佐证,并把这条论断视为对“两个不可避免”的补充和修正。不可否认,从理论分析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的确具有资本主义在“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49]不会灭亡的内涵。从这一论断,确实可以从逻辑上推导出资本主义在“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将长期存在的结论。从“后世”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两个不可避免”的确没有很快到来。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仍长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也因其自我调节而有所缓解。时至今日,在资本主义国家,暴力冲突、阶级斗争都已经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解决办法,普通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社会福利得到一定提升。这些从事实层面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仍然能容纳更多的生产力。可见,不管是从理论分析角度来看,还是“后世”的资本主义发展事实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暂时都不会灭亡。但是,如果回到“两个决不会”提出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两个决不会”并不是对“两个不可避免”的补充和修正,恰恰相反,“两个决不会”所要表达的内涵是“两个一定会”,和“两个不可避免”内涵具有一致性。1859年,马克思提出“两个决不会”,就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全部发挥出来,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也已经在旧社会的

胎胞里完全成熟,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灭亡,共产主义一定会出现。因此,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需要通过革命来促成“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50]的形成。这表达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期待。回顾马克思1859年前后的思想历程会发现:1848年,马克思提出“两个不可避免”;1849年到1850年间,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马克思乐观地预测“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51];185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新的危机”,为了研究这次危机,马克思通宵总结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52],在马克思看来,这场“洪水”标志着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全部发挥出来;1867年,马克思更是认为英国的“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这个十分明显的变革过程,即“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胎胞里逐步成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53]。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1848年到1867年将近二十年时间里,马克思一直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可避免,他不可能在1859年,提出一个和自己一贯观点不一致的论断。所以,“两个决不会”不是对“两个不可避免”的修正。不能离开历史文化语境,把“两个决不会”的字面内涵、我们解读出的内涵和后世的发展事实等同于马克思提出“两个决不会”本身想要表达的意思。

总的来说,回到时代语境是就社会背景而言,考察的是具体结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强调不能把马克思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具体结论永恒化,是从宏观意义上阐述原初语境;回到思想语境是就理论本身而言,考察的是具体结论与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关系,强调不能离开思想的整体性去孤立地理解具体结论,是从中观意义上阐述原初语境;回到文本语境是就文本的逻辑自洽性而言的,考察的是具体结论的文本出场,强调要从文本的针对性和上下文中去理解具体结论,是从微观意义上阐述原初语境;回到历史文化语境强调的是从结论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理解结论,是从“作者”视角去阐释原初语境。当然,突出马克思具体结论的语境性,并非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是强调

马克思任何一个具体结论都有特定的前提和背景，要完整掌握其理论体系，最重要的是掌握理论出场的逻辑，要把具体结论放到原初语境中去理解。不能离开特定语境理解、使用马克思的具体结论。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7.
- [2][3][4][12][15][23][27][28][29][30][31][32][40][43][44][46][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G].人民出版社,2009:533,544,544,607,531,185,10,502,509,510,525,535,4,4,3,3-4,3.
- [5][22][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G].人民出版社,2009:593,106,140.
- [6][25][33][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G].人民出版社,2009:874,683,415-416,9.
- [7]张静.俄国道路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思想家的对话和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7).
- [8][9][10][11][13][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G].人民出版社,2009:703,590,465,466,448,448,449.
- [14][19][21][24][35][36][37][38][39][48][49][50][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G].人民出版社,2009:43,31,9,53,45,591,45,47,45,592,592,592,176.
- [18][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55.
-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G].人民出版社,2016:590.
- [26][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G].人民出版社,1998:108,21.
- [41]陈荣富.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再认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6).
-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G].人民出版社,2009:274.
- [45]聂锦芳.“重读马克思”: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J].学术界,2023(7).

(责任编辑 于朝霞)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Context to Understand Marx's Specific Conclusions

Li Shuangtao

Abstract: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m, every specific conclusion has its original context in which it arises. Only by starting from the original context can we accurately grasp the basic viewpoints of Marxism,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Marx's specific conclusions, and scientifically apply them. The original context includes the time context,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the text context,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Returning to the time context refers to examining the specific conclusions of Marx in what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olving the "time gap" problem between our understanding today and the era in which Marx lived. Returning to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refers to returning to the holistic nature of thought and understanding Marx's specific conclusions within Marx's overall thought. Returning to the text context refers to understanding Marx's specific conclusions from the specificity of the text and the contextual context.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refers to understanding Marx's specific conclusions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which he arrived at them, rather than viewing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s" or "future generations" instead of "authors".

Keywords: Time Context, Ideological Context, Text Contex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Specific Conclusion